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成果

ERSHI SHIJI
ZHONGGUO
BIJIAO
JIAOYUXUE SHI

二十世纪中国 比较教育学史

丛书主编 | 项贤明
作 者 | 生兆欣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与比较教育研究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前沿性的作用。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本书对自上世纪初以来的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以严谨、平实的语言再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教育改革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制度、学术研究的逻辑脉络与时代特征。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ERSHI SHIJI
ZHONGGUO
BIJIAO
JIAOYUXUE SHI

二十世纪中国 比较教育史

丛书主编 | 项贤明
作 者 | 生兆欣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与比较教育研究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前沿性的作用。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本书对自上世纪初以来的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以严谨、平实的语言再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教育改革背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简介

本书在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视野下,整理分析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和学术发展的百余年文献,全面展现了我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图景,深刻剖析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独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这种发展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本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以时间为线索,分四个历史时期概括了中国比较教育学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制度发展和研究成果的阶段特征;第二部分(第二、三章)以研究专题为线索,分别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课程教学以及比较教育学科本体问题四方面的百余年发展进行了历史梳理与评析;第三部分(第四章)以学科发展的要素为线索,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实践环境、实践主体、实践性质及实践结果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比较教育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比较教育学科研究领域的空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生兆欣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3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论丛/项贤明主编)

ISBN 978-7-04-031132-7

I. ①二… II. ①生… III. ①比较教育-教育史-中国-20世纪 IV. ①G40-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7005号

策划编辑	王玉衡	责任编辑	王玉衡	封面设计	赵阳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刘思涵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6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1132-00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论丛”

总序

比较教育作为教育科学学科群中唯一一门专门从事跨国界、跨文化之教育研究的学科，尽管产生较晚，但在进行教育科学探索和引导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代教育的发轫和发展、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比较教育都曾经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加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不仅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都有着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为了促进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更好地发展，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设立了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专门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问题。我们课题组承担这一项目的研究工作后，迅速组织学术力量分别从学科历史、学术生态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就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由于长期以来本学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不多，学术积累有限，我们只有从最原始的学术资料搜集工作入手，项目研究进行得非常艰苦。几年来，我们搜集整理了数以千万字的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对西方比较教育的重要流派进行了新的归纳和分析，并对影响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社会因素，以及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了反思，进而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从多方面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作了一个比较全面和相对深入的探讨。在项目研究进行过程中，我们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而这套丛书则是这个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

在这套丛书中，生兆欣副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了比较教育学科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百余年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这是本项目研究的三大维度中最基础的部分，在各子课题中搜集整理的原始学术资料最多，研究中还遇到了某些特殊年代政治因素对比较教育学术的消极影响等较难处理的学术问题，能最终获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历史研究相对应，王黎云博士的《西方比较教育流派：中国的视角》从探索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道路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西方比较教育的一些基本流派，研究分析了这些学术流派的

学术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并且就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田小红博士的《知识的境遇：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生态研究》则是从知识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对比较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理性的清理和反省，试图弄清比较教育的知识类型、学科属性、学术生态关系等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我的《比较教育学方法论》则是在这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在分析研究西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同时，探索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及其体系建构。除了现在呈于读者面前的这几本书外，在全面搜集整理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还在国内首次编纂了《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文献索引（1900—2010）》（暂名），拟将其作为一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研究工具书，奉献于广大读者。

在共同的研讨过程中，我们课题组一致认为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一项质量低劣的学术成果，其学术价值上所打的折扣，用所谓的效率是无法弥补的。基于这样的共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奉献最优质的学术成果。然而，由于课题研究难度较大，相关学术积累不足，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多有讹误，还望能得到读者的赐教。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仅有赖于本门学科的知识生产过程，还要依靠相关学科提供的知识滋养，更受到社会对该学科知识需求的影响。作为一门专门对教育现象进行跨文化、跨国界研究的教育学科，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我们要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感谢相关编辑为此套丛书付出的辛勤劳动，也要感谢所有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学界同仁异口同声地惊呼比较教育学面临学科身份危机的状况，我们的确应该共同探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这可以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教育学者们的共同使命之一。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了教育改革实践对比较教育学强烈的知识需求，看到了比较教育学在教育科学学科群中重要而独特的价值，看到了比较教育学自身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相信，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项贤明

2010年12月8日识于北师大英东楼

作者简介

生兆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学科理论、比较教育政策。200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200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历史发展概述	14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比较教育学 (1901—1949)	14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中国比较教育学 (1949—1965)	30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中国比较教育学 (1966—1977)	42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较教育学 (1978—2004)	50
第二章 比较教育的三大研究领域	65
第一节 20 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	67
第二节 20 世纪外国教育制度的引介与参照	80
第三节 20 世纪课程教学的西方译介与本土改造	98
第三章 比较教育的学科本体问题	119
第一节 对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探求	120
第二节 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的认识	129
第三节 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讨论	139
第四节 对比较教育学科性质的争议	154
第四章 历史实践省思	163
第一节 实践环境	163
第二节 实践主体	174
第三节 实践性质	182
第四节 实践结果	191
主要参考文献	201
图表清单	213
后记	215

导 论

对中国来说，19世纪是一个备受列强凌辱的世纪。一次次的外敌侵略，一款款的不平等条约，把清末的历史撕扯得支离破碎。外敌的入侵，不仅强行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也给西方文化的传入创造了机会。鸦片战争前后至19世纪末期，随着大批外国来华传教士的译文著述，国人（包括外交官和先进知识人）跨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后的归国著述和自主引介西方教育的活动，最终引发了近代中国译介西方教育的第一次高潮，^①为20世纪全面了解西方教育实践、吸收西方教育观念做了前期的铺垫。

20世纪是个动荡的世纪，中国乃至全球社会，在这“躁动的百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范围的“一战”、“二战”、“冷战”，一次次改变着世界的权力格局；国内社会也经历了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这样三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变迁。20世纪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便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1901年，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前辈在上海创办了以翻译和介绍国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为国人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舞台，开启了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前学科研究阶段”。随着专有名词“比较教育”的引入与相关学校课程的开设，作为专门学问的比较教育学在中国初步确立。之后虽历经波折，但比较教育研究活动并未停止，从20世纪上半叶的滥觞并表现出初步的多元化色彩，到历经50年代的“亲苏”、“文革”时代的“闭户”，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发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比较教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在中国大陆安了家。但安家并不等于落户。一直以来，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忽略了对自身研究活动的反思。比较教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并没有形成自身的话语系统，这样的结果使比较教育对教育问题解释上的权力合理性受到了怀疑，或者说它放弃了以自己的话语去解释教育现象的权力。^②研究领域的宽泛、研究方法的薄弱、研究深度的不足、研究功能的衰落，表明比较教育学正陷入学科身份的危机。名正言顺的“户口”成为新时期比较教育学者苦苦追寻的目标，

① 田正平. 中外教育交流史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 311.

② 朱旭东. 民族—国家和比较教育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1999 (2): 3.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站在世纪的转捩点上，盘点史实、爬梳文献、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回顾百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之演化，勾勒历史之流变，反思研究之规范，烛照未来之发展，是当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之要事，也是本书的根本任务。立足于过去一个世纪已有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本书将着重探索中国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在百年历史中发生、发展的阶段特点，揭示中国比较教育理论、思想及实践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探寻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机制，希望通过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史、学术史的梳理，能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学术史的书写和一般历史的书写有些差别。通常情况下，一般历史的书写，即关于社会实践历史的书写，重点在史料。这一点，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提出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里得到了集中体现。既然学术史也是史，那么材料对于学术史研究来说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指向社会实践有所不同，学术史的对象是学术思想、话语实践，是对社会实践进行反思的思维实践。因而，学术史的书写恐怕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上，还要在反思和建构上体现功夫。波兰社会学家兹纳尼茨基（Florian Witold Znaniecki）认为，伴随知识积累而出现的知识史学家，“起初，他只是其他人的思想与观察结果的搜集者，通常以‘公正的’评价判断点缀其间。然而最后，客观地决定历史事实的任务，充分重建与诠释过去的理论的任务，因而使它们免于被忘却或误解的任务，最后追溯与解释知识之历史进化的任务，产生出了特殊的理论问题；历史学家从仅仅是其他人寻求真理经历的记录者，变成为真理的探究者，且有其自身特殊的科学探究领域”^①。也就是说，学术史研究者不仅是学术历史信息的搜集者，还应是学术成果的评价者，更重要的是学术史发展机制的理论构建者。本书对比较教育学术史研究的定位，也不仅在于记录、评述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还要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进行理论阐发和建构。

为此，本研究将以百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必要时辅以组织、机构、人员资料加以说明）为原材料，借助于话语实践、场域、知识社会学等理论分析视角，对20世纪中国（大陆）比较教育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展示其发展轨迹，解释该轨迹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并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比较教育学术活动的基本原理。

一、相关研究现状

兼具“史”和“中国（大陆）比较教育”性质的文献有二类：一类是

^① 弗·兹纳尼茨基.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M]. 郑斌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02.

“教育历史的比较”，另一类是教育史、教育学史中涉及的“比较教育史”，或者纯粹的“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回顾”。第一类属教育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为本研究提供素材，其中，张瑞璠、王承绪教授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系列，可谓此类研究的典型范本；第二类是比较教育史或比较教育研究史，具有元研究性质，可为本研究提供参照。因第二类研究与本研究的性质颇为相似，下面仅对第二类研究进行分析。按照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可以将第二类研究文献分为两种，即“百年回顾型”研究和“阶段分析型”研究。

（一）百年回顾型研究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许多百年回顾型研究成果开始涌现，特别是在教育学发展的百年回顾和反思性研究方面。在这类文献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一些近现代中国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状况。

顾明远先生的《中国教育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一书着眼于文化底蕴下的中国教育变革，以较大篇幅梳理并反思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直至目前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国外教育影响下的变迁，包括西学东渐、清末仿日、民初学美、新中国之初学苏及改革开放后的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要把握“教育变迁之流”必先认识“文化变迁之源”的观点。

王承绪先生的《比较教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其中一节以 30 页的篇幅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比较教育活动进行了大致勾勒，包括学制模仿、著作译介、比较研究以及相关的人才培养、组织机构建设等活动。

《比较教育的世纪回顾：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访谈录》（汪利兵，《外国教育资料》，1996 年第 5 期）一文以王承绪教授的亲身经历勾画出百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的粗略线条。王承绪教授提出，192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庄泽宣的《各国教育比较论》一书，比康德尔的《比较教育》早 4 年，庄著提出的国别分析中的地理、民族性等因素，比汉斯讲的民族性、地理因素早 10 余年，因而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形成时间与英美不相上下。王承绪先生还认为，我们当前的比较教育研究，对象国应该扩大，国别研究仍有待系统、深入，各研究团体应当适当分工。此外，金世柏先生的《比较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外国教育》，1986 年第 4 期）一文也粗略地描述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脉络。

郑金洲、瞿葆奎先生所著的《中国教育学百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回顾了教育学（教育基本理论）引入中国并生根、生长的历史。在教育学经历“四次高潮，两度曲折”的百年发展中，国外教育学著作的译介总是引领着中国教育学发展高潮的来临，四次高潮包括 1900—1919 年从日本引进赫尔巴特教育学著作，1919—1949 年间杜威教育学、德国文化教育学、苏联唯物主义教育学受到青睐，1950—1956 年间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

教育学广为传播，1976—2000年“放眼世界、四海择珍，广收教育信息”的教育学新时代；而两度曲折则是对外封闭的结果。

叶澜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其历史分期大致与郑著相同。但在叶著中，教育学是指教育学一级学科，里面包含了对几个主要二级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与郑著相比，叶著审视了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教育学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了对二级学科发展状况的梳理，对杜威、赫尔巴特思想所引起论争的重点分析，还对组织、机构、书刊出版、交流活动等进行了介绍；在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译著统计方面引用了侯怀银的统计资料，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国外教育译著引进的大致情况；附录部分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大事记”粗略展示了教育学发展的世纪脉络。

田正平教授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是笔者目前查询的著作类文献中资料最为翔实的一部。该书对我国明末清初、晚清、民国、新中国等四个历史时期的中外教育交流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其中有五章的篇幅用于描述近现代中国译介西方教育的三次高潮，并对官方考察、民间交流、留学活动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分析。该著具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历史跨度长等特点，为我们展现了几百年来中外教育交流活动的生动而又细致的历史全景。

马克·贝磊（Mark Bray）与桂勤合著的论文《大中华地区的比较教育：背景、特色、对比及贡献》（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contexts, characteristics, contrasts and contributions）颇为简略地回顾了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比较教育的演进历程，扼要分析了其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力量，对四地的状况加以比较并辨析其异同，点出了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世界比较教育发展的贡献。

上述“百年回顾型”研究，气势恢宏，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面，但对于本研究之梳理百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术史的目的来说，以上这些研究则不能满足需求。如，从分析对象上看，虽然此类研究关注的时段较长，但多关注对外教育学习、中外教育影响和交流活动，缺乏对学术研究活动以及学术成果本身的研究；从整体表述来看，上述著作或论文的概括性强，但较为缺乏数据统计；从对材料的分析来看，它们大都史实丰盈、资料翔实，偏重述史而较少立论。

（二）阶段分析型研究

阶段分析型研究，因其分析的时段较短，其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按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阶段，可以将此类研究分为三类。

集中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学者有侯怀银、周谷平等。

侯怀银着重从教育学体系的引入出发，考察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状况及特征。在《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山西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一文中，他提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初现阶段，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和以“中国化”为主要特征的初步探索阶段。经过 20 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教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都已在中国形成，并初步建立起了学科体系。该文还对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形成时间进行了考察，其中，比较教育学的形成时间是 1929 年，以庄泽宣先生《各国教育比较论》的出版为标志。侯怀银的另一篇文章《20 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教育研究》，2001 年第 12 期）对 20 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与反思。作者提出，引进是教育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起点，但引进也导致一种照搬外国教育学模式倾向的形成，为此，引进应具有自主意识并达到求其会通的境界，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植入性转到生成性。周谷平的研究则侧重于探讨西方教育理论的引入和传播。在她的专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中，她考察了赫尔巴特、杜威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引入、传播及其影响。

对新中国建国初学习苏联阶段的研究有顾明远先生的《论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 1 期），该文论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方针，对我国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苏联教育经验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表现为：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建立新型学校，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等。苏联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模式以至教学方法被全盘接受，完成了本土化，而且有所发展。中国现在的教育传统，除了继承中国传统的内核之外，还融入了苏联教育的传统。属于此类研究的还有邹时炎的《对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经验的认识》（《教育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刘茗、王鑫的《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历史回顾与思考》（《辽宁教育研究》，2003 年第 11 期），姜树卿的《关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认识与评价》（《中国高教研究》，2002 年第 7 期），刘松林的《建国初期教育领域的崇苏思潮》（《世纪桥》，2004 年第 3 期）等。

有关改革开放后比较教育状况的回顾型研究较多。顾明远先生的《我和比较教育》（《比较教育研究》，2005 年第 1 期）以亲身经历回顾了《外国教育动态》杂志、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的创立与发展，以及我国比较教育学界与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董秀华的《我国比较教育理论研究十七年：文献分析》（《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6 年第 5 期）对 1979—1996 年间发表的比较教育理论研究的 62 篇论文、出版的 15 本著作

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就比较教育的定义、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核心理论问题的众多争议进行了简要梳理。延建林的《80、90年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主题的演变》（《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针对《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研究》三种期刊在1980—1999年间发表的4199篇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就区域研究而言，我国比较教育已经迈出多元化的步伐，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情况进入研究视野；就问题研究而言，80年代较多关注基础教育，90年代较多涉及高等教育，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也逐渐增强。纽约州立大学陈树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Comparative education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回顾了1979—1989年间中国大陆的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机构、比较教育学者、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等状况，并对大陆比较教育研究的趋势做了展望。其中，对比较教育研究状况的分析，涵盖了期刊、专著和译著等三类成果。作者对四种主要比较教育期刊的2697篇论文、中国学者撰写的58本比较教育专著、翻译的65本著作进行了国别、专题方面的分析。刘卫东在《中国比较教育危机之我见》（《比较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对1990—1993年间《比较教育研究》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当时的比较教育研究对象存在“西方中心”，研究方法“停留在介绍描述水平上”。高益民、王春华的《“九五”期间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进展》（《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分析了1995—2000年间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学术著作和学会活动，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观点，分析了三大主要比较教育专业期刊（《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研究》）的1162篇论文，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目前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偏重区域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区域研究也并不成熟。香港大学的郑文伟在2005年8月向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提交的论文“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e progress of localization”分析了1996—2003年间《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展望》^①两本期刊发表的1993篇论文，认为中国大陆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中国倾向”、“比较倾向”逐渐加强，而不再是单纯的外国教育研究了。此类研究还有田建荣的《从对〈外国教育动态〉的统计看我国80年代的外国教育研究》（《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2期（增刊））等。

“阶段分析型”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较小，容易相对集中地进行分析，数据统计也容易进行，有着小而精的特点。但上述研究也不能满足纵观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史的需要，譬如由于回顾的历史跨度短，多为4年、5年、10年，最

^① 《全球教育展望》原系《外国教育资料》，2001年更为此名。

长为 20 年，不易观整体之貌；数据统计多出现在对改革开放后比较教育成果的回顾研究中，缺乏与其他历史阶段的比较；选取的分析对象有限，只针对一种、二种或四种期刊进行，范围较为狭窄；分析不够充分，结论多为对阶段发展特点的归纳，缺乏理论提升。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立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收集更加系统、广泛的原始材料，统计更为确证的数据，采用某一分析视角，提出自己关于 20 世纪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史的认识。本研究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拉长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考察百余年中国大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使得百年风景尽纳眼底，流变断裂明晰可数；（2）尽可能全面收录历史文献：以权威索引为工具，辅以网络、期刊，尽可能疏而不漏；（3）采用较为新颖的考察视角^①：对作为话语实践的比较教育研究，本研究不仅识别该领域话语变迁的时代特征，还考察其话语生产与社会历史的关系；（4）力争在学理上有所提升：既“述”又“作”，不仅展示历史流变，更揭示作为话语实践的比较教育研究之本质。

当然，这里还需对本研究所涉及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进行简要说明。首先，它是指中国学者进行的比较教育研究，抛除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教育进行的研究，这是因为，尽管后者有时也被翻译成中文，而且也有利于我们通过他的眼睛反观自我，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应该算作国外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其次，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行的教育研究作品，一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它也被包括在本研究范围内，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包括康德尔《比较教育》在内的“比较教育译丛”。实际上，这些翻译作品是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港、澳、台学者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精力、时间以及收集资料所限，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统计和分析比较困难，因而本研究在统计对象上也舍弃了这部分文献，仅在引证需要时会点滴涉及港、澳、台比较教育学者的观点。

二、本研究的任务和方法

本研究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 20 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分析，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百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的

^① 项贤明教授的《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一书“通过对潜藏于我们的比较教育学学术实践中的文化权力关系和文化自我意识的反思，获得关于比较教育学这种跨文化学术实践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其第五章《话语·权力·体系》更是集中探讨了作为话语实践的比较教育学之内在学理。该著的分析视角给本研究启发甚大。

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发展大致可以区分为几个阶段？各阶段有何特点？（2）百年来中国比较教育专题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什么因素规训了其发展轨迹？（3）作为话语实践的比较教育研究活动，哪些实践要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中国比较教育的知识生产？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即描述、分析和解释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专题研究状况以及话语实践的核心要素，就是本研究的主要任务。

本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料，具体来说，它既包括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相关的组织、会议资料及政府公文、年鉴等，也包括所有形式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比如著作、文章、博硕士论文，甚至给政府提供的研究或咨询报告等。考虑资料获得的可能性与研究时间的有限性等因素，本研究定位于三类资料：百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比较教育著作、各大报刊发表的比较教育类文章以及与学科制度建设相关的年鉴、公文等。资料的时间起止大致为“20世纪”，但并不严格限定在1900—1999年间。起始时间基本从1901年我国第一本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创刊开始（因为专业期刊的创立对于学科制度化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著作资料还包括了1900年出版的；终止时间统一截止到2004年底。之所以截止到2004年，除了主要受本研究开始着手的时间限制之外，还考虑了其他两个因素：一是研究成果的生产周期决定了20世纪末的研究成果可能到21世纪初才发表、出版；二是对连续性、系列性研究成果的分析不应戛然而止，宜等待其出齐后再作全面分析。因而，本研究的总体时间段大致为1900年（著作）或1901年（论文）到2004年。

（一）资料统计来源

资料源是决定研究成果合理性、适用性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分类统计百年来的比较教育研究状况，本研究通过查询索引、原刊，以及图书馆藏书目录等多种资料源，分别建立了比较教育论文数据库（包括“1901—1949年数据库”、“1949—1965年数据库”、“1966—1977年数据库”、“1978—2004年数据库”）和比较教育著作数据库。其中，论文数据库收录论文条目4万多条，著作数据库收录著作条目3千多条（这些条目将另行整理出版为《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文献索引（1900—2010）》（暂名））。下面将本研究的资料来源分类列陈。

1. 论文资料的主要来源

20世纪上半叶的论文资料数据库建设，主要参照了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数据库，包括“1857—1919”数据库、“1920—1949”数据库和“1920—1949”增订版数据库。1910—1930年间的数据库建设还参照了国立中山大学邵爽秋等编录的《教育论文索引》（1926年）及其与彭仁山共编的增订本（1932年）。1949年的数据库建设还通过查阅《中华教育界》、

《中苏友好》、《东北教育》等原刊目录，以弥补《全国报刊索引》在这一前后交界年所缺乏的数据。

20 世纪下半叶的论文资料数据库建设，主要参照了上海图书馆发行的 1951 年到 2005 年（1966.10—1973.9 期间停刊）《全国报刊索引》各年度纸质本资料，并配合它的网络版数据库补充纸质本中缺乏的条目。在“文革”期间，该《索引》停刊，正式公开发行的外国教育杂志也没有诞生，故这一时期的数据库建设主要是通过查阅《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日本教育情况》、《日本问题研究》四种内部期刊的原刊来完成的。1950 年的数据库建设同 1949 年类似，主要参照原刊完成（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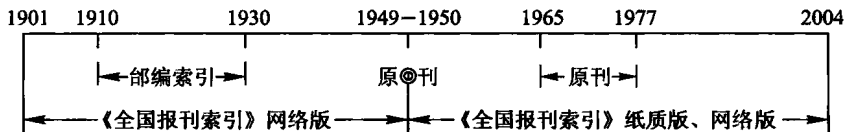


图 1 论文资料的主要来源

2. 著作资料的主要来源

相对于论文资料来说，著作资料的数据库建设则容易得多。20 世纪上半叶的著作资料数据库建设，主要依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著的《解放前出版的教育图书目录》（1949 年以前）以及北京图书馆编著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两本纸质索引文献，另外还参照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通过国家图书馆索书系统检索补充。20 世纪下半叶的中著资料条目主要来源于田东平等编著的《中国教育书录》（1949—1990）和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详见图 2）。从上述来源中收录的著作资料条目，仅包括翻译、介绍、评注西方教育理论或实践的著作，不包括国人翻译的外国学校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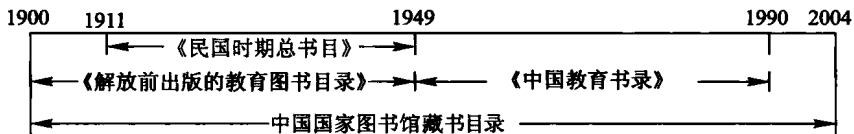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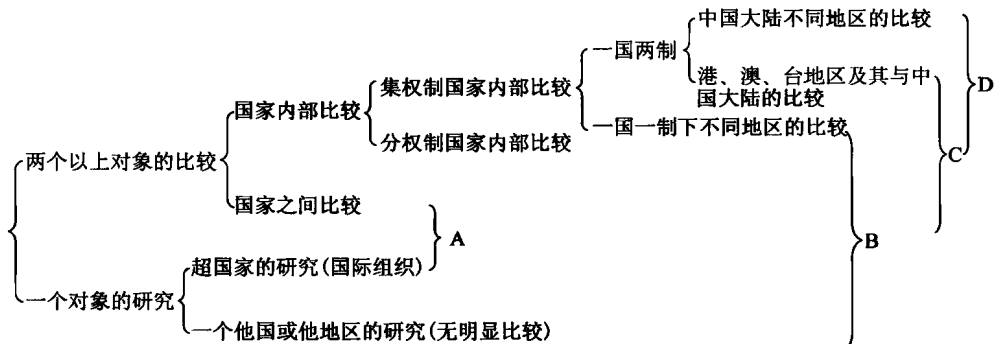
图 2 著作资料的主要来源

（二）资料收集标准

有研究者认为，当前的比较教育研究几乎“无边界”。^① 这种说法，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比较教育研究边界模糊、研究对象标准混乱的状况。以

^① 朱旭东. 试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无边界特征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5 (10): 7—13.

比较教育研究对象为例，学者们观点各异，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详见图3）。



- A: 共同的观点（最核心的对象，无争议）； B: 朱旭东的观点；
C: 部分学者的观点； D: 黎成魁的观点。^①

图3 关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之不同观点

学者们对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认识存在如此之大的分歧，这给本研究的具体操作带来了困难。如何区分“比较教育”与“非比较教育”资料？笔者分析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刊《比较教育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并以它的标准作为本研究收录论文的标准。通过分析发现，以上类别皆可以从《比较教育研究》中找出对应文章，也就是说作为会刊的《比较教育研究》发表的论文涵盖了最广泛的研究对象，如上图中D所示。鉴于本研究是对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史进行梳理，本研究的收录标准也放宽到所有比较教育研究对象（也就是D）；但同时考虑到本研究无法辨别散落在众多报刊中的“中国大陆不同地区”的研究（即以国内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教育为研究对象）是否应用了“比较”的视角，因此，本研究采取了“C”观点和“D”观点相结合的折中办法，即对于中国比较教育的四种核心期刊《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资料》^②、《外国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采取“D”标准，收录了它们刊登的所有文章，而对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则采取“C”标准收录。

除了上述标准之外，在具体收录、统计的过程中，还涉及更加细微的统计标准。比如关于著作的统计，同一本外文原著的不同译本，或同一译者的不同版次的译本，以及同一译者、同一译本的不同年代的重印本，在本研究的收录统计中也都包括在内，因为它同样反映了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的关注点。其他一些细节，将在行文中针对具体情况再作针对性说明。

^① 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

^② 2001年后更名为《全球教育展望》。更名后，在内容上也做了相应改变，改变了原有纯外国教育研究的特色，增加了许多中国本土教育的研究内容。因而本研究对该刊物的处理方式是，2000年以前以“D”标准全部收录其论文，2001年以后以“C”标准进行处理。